

捷克狂想曲--「嬰兒箱」的道德爭議

高子雯

在某個微冷黃昏，沿著一條叫做 Jugoslávská 的巷子突然發現連接著類似於戶政事務所（Osobních dokladů a Ověřování，中譯：身份證和證明的事務所）的辦公大樓，現代化的牆面上寫著「Baby box」，嬰兒箱的標誌是一個被打著大叉叉的嬰兒。首先是對於一個紅色的嬰兒與大叉叉，瞬間聯想起色彩學中紅色所帶來的張力與「叉叉」那種在考卷上被修正的挫敗感，這個大紅色的叉叉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在一個象徵著「新生」的嬰兒上，這種挫敗與被拋棄的衝突感更盛。

嬰兒箱（Baby box）實際上非常相像於在大型餐館內為了運送餐點方便而設計的菜梯，除了紅色 logo 外，便只有冷冰冰的不鏽鋼閘門，旁邊有一個綠色按鈕及說明牌。嬰兒是純潔的、脆弱的、尚未發展的、也是需要高度照護的，在一個如此柔軟的生命之上，我們總是將嬰兒的印象和織物相連結，「捧」在手掌心以及肌膚之親那種溫度的連帶及肉體的接觸和不鏽鋼的閘門形成強烈對比。將一隻家犬關在鐵製的狗籠中都尚且覺得有些於心不忍，將新生的嬰兒放置在如此凜冽的現代化裝置內，彷彿就連嬰兒較高的體溫都被現代化社會的冷漠給降溫了。現代化標誌著一

種高效能、高產出、低成本，嬰兒箱也在其列，好似一種人為「生產」的附屬品，著實希望富有人性且作為下一代新生的嬰兒，即使不再有血緣或社會責任的連帶，也都能被給予更溫柔的對待。



在布拉格 2 區嬰兒箱，最上方的說明欄寫著：按下綠色按鈕，門將自動打開。將一個孩子放入（Insert）盒子中，十五秒鐘後，門將自動關閉。

嬰兒箱通常設置在醫院、醫療診所的外牆，按下閘門旁的綠色按鈕便會開啟，在沒有監視器及文件簽署的流程之下，「任何人」皆可以將新生兒放入閘門內的塑膠製自動保溫箱，15 秒鐘後便會關門。並且自動維持嬰兒的體溫，通知護士及社工人員，後續由醫院及

社工單位協助嬰兒領養。母親或放置嬰兒者不需要留下任何基本資料，同時在放置嬰兒後母親也就此和這個嬰兒除血緣外無任何社會連帶。在這 15 秒，決定著一個媽媽與他懷胎 10 月所誕生下來的生命的一切社會連結。媽媽與孩子的血緣連帶將會永遠存在，但是他們將不會踏入彼此的生命之中，他們將不會擁有相同的姓氏，不會一同經歷學業的困難，不會共度未來的那些聖誕節，但是或許孩子也不會跟著三餐不繼，或者居無定所，甚至是面對一個會家暴的家庭。這 15 秒鐘，我相信一定是最煎熬的，嬰兒箱(Baby box)的「X」其實是不正確的符號，與其說嬰兒箱是放棄了孩子(棄嬰)，不如說是對於生命的價值的珍重，並且希望他未來能夠擁有美好生活的祝福。還記得當下看到嬰兒箱的第一反應，除了是如同閒逛者所受到意料之外的好奇，更是一種跳脫於原初文化習慣的震驚。自那著名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獨尊儒術以降，儒教的³家庭觀念是一條密不通風的克分子線，既是守著作為子女的這端，更是限制著父母那端；之於社會，這條克分子線本身更是國之根本，不能動搖。為了追求個人的幸福而拋下一切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看見捷克嬰兒箱作為具體化的「拋家棄子」，肩上一條小生命的責任竟然可以如此輕易的斬斷而不受罵名是令我難以想像的。

不同於北歐的嬰兒箱是將所有嬰兒用品放置在紙箱內供新生兒父母使用的社會福利

制度，嬰兒箱(或 baby hatch)最早可以追溯至 12 世紀的義大利教皇英諾森二世(Pope Innocent II)對於每年被遺棄在台伯河的棄嬰數量感到不安，便在醫院或教堂的外牆安裝「棄兒輪」(foundling wheels)，是個類似於旋轉門的裝置¹，每當有孩童被放置在嬰兒床內，輪子便會轉動並將嬰兒安全的送至建築物內並由教堂或醫院照料²。希望能夠減少棄嬰的數量，更保留了嬰兒的生命權。捷克的嬰兒箱一開始是由捷克詩人及企業家 Ludvik Hess 首先提倡，而後由非營利組織 Statim 協助投資與建設，在 2005 年布拉格 9 區的一間醫院設置了第一個嬰兒箱，根據官方資料及統計數據，如今在捷克不同地區與鄉鎮共設置 76 個嬰兒箱³，2019 年 10 月 16 接收第 197 名嬰兒⁴，共有 111 名為女嬰，86 名男嬰。因為嬰兒箱，這 197 名嬰兒免去了出生幾小時後被丟棄的風險，沒有被貼上「不被希望生下來的孩子」的標籤，而是因為這嬰兒箱，擁有了歡迎他的到來的家庭及更良善的照顧。

當我第一次接觸嬰兒箱我首先想到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生出來』？我可以理解沒有安全性行為，可以理解墮胎，但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什麼會生下來？以及，生下來之後怎麼可以不扶養？」這其實顯現了「性意識—性行為—家庭」的脈絡，嬰兒箱是性—慾望的產物，捷克的性意識也就成為嬰兒箱本章必須探討的重點之一。

捷克的性意識總是開放、自由而外顯地反

映在文學作品上，三大捷克文學家赫拉巴爾、米蘭昆德拉和伊凡克里瑪或多或少都在其著作中撒上一點性行為的哲學，並且總是開誠布公的從環境、場景、貼身衣物的顏色、材質、甚至是行房時若有似無的呢喃無一不細細傳達，我曾經問過來自捷克的交換生 Ondra，為什麼捷克人總是在任何文學裡都要參雜點性行為的描述，他說：「因為那是人類最原始的慾望之一，又或者只是作者本身的另一種癖好。」這讓我想起某次在社會系研究室，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和台灣學生們討論關於婚前性行為、出軌及網路交友等議題，兩岸學生們個個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想法，而後我詢問中國學生：「中國大陸對性研究的討論應該也蠻熱烈的吧？」他默默地回答：「只有越是民主自由的國家，高知識份子們才越是會將性研究搬上台面討論，要不然一定是難以啟齒的。」這些交談的經歷反應了傅柯《性史》中關於性的權力、話語權以及性語言的形塑過程，捷克經歷了基督教、納粹及後來的共產統治，無一不是強制性壓抑的統治體制，如今卻能在捷克文學中、夜晚的瓦茨拉夫廣場上、專門的性博物館外，以及能夠捨棄母職的嬰兒箱中看到如此開放的性意識，這波經歷糾葛實屬不易。

捷克自古以來便是基督教國家的一員，即使兩次將國會議員丟出窗外仍然無法改變舊教穩穩把持體系。基督宗教信仰如《創世紀 1:27》所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

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不僅成人嬰兒也同樣是神的形象，殺嬰、棄嬰甚至墮胎便是一種殺神且不可饒恕的行為；另一方面，全能的神給予我們與之相像的形體，那麼一切生理無法抗拒的罪惡便都是可質疑的、不被允許的（波斯納，2002）。性交的目的只是維持種族的繁衍，性本身就是原罪，並且是需要被壓抑的慾望，性壓抑的終極目標是打擊無意識的性意識：即使是在夢裡，也都不能有春夢。性作為原罪，宣判其有罪的系統便是基督宗教信仰，被宣判有罪的罪人們，就必須坦承自己，向上帝（或其在地上的代理人：神職人員們）告解。在傅柯那裡，向神父懺悔自己的性慾念既要詳加描述避免人與肉的偏離，又要委婉隱晦「他就是被表現出來的懺悔行為、自我懲罰以及自我揭發」（93）此時便產生了性及權力的第一道社會連帶：性—原罪必須透過告解及懺悔來獲得原諒。性作為慾望，基督宗教體系下的告解便是其約束的克分子線，透過建立社會連帶的自我揭露，承認罪行。

而捷克的性意識則因為歷史脈絡的差異在大環境的影響之下稍有不同甚至呈現與歐美反向而行的脈絡，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性行為一家庭上能夠有長遠計劃的政治體制是在德國納粹後接手的共產黨政權，其四十一年統治時期，約略被捷克布爾諾馬薩里克大學性學家 Katerina Liskova 藉由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統治時期的性學文

宣、民眾教育手冊等書籍探討共產黨的性政策而分做兩期：1950年代和1970年代。

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初，一如所有新興學子對嶄新的、現代的共產新世紀的想像都是美好而進步的。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性政策在如今看來仍然與上述的形容詞完全匹配：強調性別平等、女性解放、開放性教育及墮胎的自由意願等，這幾項政策和「共產黨」這三個字所帶來的普世印象截然不同，但若是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相應，倒是走在一條擁有相同願景的康莊大道之上（Sandomirsky, 1951）。

想像一下完全符合共產—社會大同理念的國家：女性和男性為社會提供相等的勞力付出，為了整體社會而參與勞動生產、加入工會、參與社會體制替你分配到的工作，在1950年初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權認為男女的交往應該是在一個公共的、集體的工作場域下一見鍾情，只要「性別平等」這個概念伊始，許多社會政策便大大的不同：在愛情與激情的基礎下（而非家族聯姻、媒妁之言）而建立家庭，結婚是純粹愛的結合而非資本主義透過婚姻轉移金錢和特權的手段，性行為就成為生理及生產的自然本能（但是「自然本能」不包含無法生育下一代的同性戀），既然性行為是自然的，那和下一代的孩子就應該更自由的討論性和性教育；因為性別平等，性行為便不是專屬於男性的享樂，要求性節制、強調女性的性高潮就如男性的一般重要；有了因愛

而結合的家庭之後，「社會化家戶」（Socializing the household）為了使女性擺脫廚房，公共托育、育嬰假、醫療體制及退休金等社會福利讓女性可以走出家門，為社會勞動；而女性地位的提昇也代表擁有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利，墮胎不僅是合法的，「放棄母職」的考量更應該以母親的意願為重，健康問題更只是其次。

在1950年代，當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的那個年代，這是一個正向循環：勞動付出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男女的相識、相戀到共組家庭、性生活自由而無需為經濟煩惱便是可能，自由的性生活與良好的家庭互動及社會福利支持便能夠再帶動工作及勞力付出，社會環境與國家經濟便能夠再次回饋家庭。這樣正向的循環看似金光閃閃令人嚮往，更是現今社會的完美典範，唯一的問題在於，這些只是「政策」。

這種由上而下、由專家知識和國家推動的政策，並不是公民素養的提升或女性主義抬頭的覺醒。就如同上述的完美循環，若是「社會環境」這個要素因為政治腐敗、經濟蕭條使得政策無法推行，後續的性生活或性別平等便淪為不實際的口號與幻想，沒有打從心底的認同性別平等，就如同媒妁之言強娶平女一般要求「性別」克服一切障礙而「必須」平等。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社會脈絡，由根莖論的觀念來看，在Katerina Liskova研究政策文宣宣傳的資料文檔仍然是以男性為主要的撰

寫者或理論政策推行者，他們能夠擁有「創造社會大同」這樣的企圖而擁有一個生成女人的身體，站在弱勢的角度理性並反省當時極為傾斜的性別關係。就如同捷克的嬰兒箱是由捷克詩人及企業家 Ludvik Hess 提倡，這位總是穿著牛仔吊帶褲的鄉下老爺爺，站在一個擁有權力的、社會支配的角度下卻能夠與弱勢站在一起進而成為「生成女人」提倡平權之風。另一方面，這種國家權力的政治體系是以一條密不通風的「克分子線」去創造平等的平滑空間，這段政策的轉移不僅顯示了分子線和克分子線不斷交纏互相創造的流變過程，更顯示國家政治對人民意志的控制與權力的運作。很顯然地，缺乏了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的一種內捲式的創造與生成，即使是正向的開放政策仍然是克分子線當中一閃而過的黃金歲月，一旦那完美的正向循環破了個洞，便功虧一簣，也就是 1970 年代這第二階段的轉變。

1970 年代開始，人們開始意識到「或許，性別分工本身就是不可能平等的？」缺乏性別平等觀念的實際接納，家務分工是不可能通過合作而相互協調的，性別是不可能改變的物種差異。家庭作為工作場所外的避風港，只有當男性的工作受到威脅時才會更加回歸家庭，亦即，家庭成為了一種反社會的動力，工作受到威脅、家務分工又無法好好溝通使得婚姻生活不再是完美、純粹的愛的結晶，甚至有人提出「婚姻生活不會通過愛而得救，而

是通過公正而連貫的秩序、紀律和組織生活來挽救」的等級制度想法，沒有了愛的婚姻便只剩下性，和一個不愛的人發生性行為還不如追求自由不被家庭綁住而擁有開放的性生活，這些種種於社會政策之外更人性的想法，使得離婚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強調個人自主及自由的風氣甚至成為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一道啟蒙之風。

自由風氣一吹，共產黨政權便擴大對家庭的控制，為了減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首先將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第二部便是鼓吹家庭成為私領域及生活回歸私有化，透過婚姻諮詢降低離婚率，人口生育補助也使得 1974 年的出生率暴增 20 萬人 (Frejka, 1980)，這些使得婚姻回歸私領域的政策使得人們減少對政治參與的渴望 (轉變為地下化的根莖式潛藏)，捷克共產黨最終在 1989 年的天鵝絨革命後將政權還給捷克，而後捷克又趕上西方女權主義的潮流。這兩階段與西方完全反向的家庭政策反應了某種捷克性的悖論，先經歷了自由、平等的風氣而後又回歸如西方家庭觀念「正常化」的階段。個人認為捷克人民在這兩段歷史中都承襲了點政策的陰霾，現今的捷克人將性行為視為一種哲學性的意識形態表達，不諱言的在文學作品中、電影裡及生活中展現性行為作為正常的慾望展現，性行為不僅可以作為青少年時期的禁果與嘗試；也可以作為下鄉勞改的一點火花；同時也可以是佔有敵人枕邊人的報復手段。上一輩

的家庭觀念則停留在共產統治時期末的家務分工及婚姻觀念之上，新一代則與後現代的潮流接軌但稍有「勇敢」的捷克性氣質，在捷克朋友之中不乏看到許多捷克人年紀輕輕剛大學畢業就結婚、生子，這是一種「因為沒有來世，此生更應該義無反顧」的想法，既然經濟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依賴，認定目前我最愛的人與其共組家庭、擁有下一代好好把握現在的大好青春一點也不為過，這種年輕氣盛的嘗試到了中、老年總有大夢初醒的可能，也使得捷克人的離婚率總是高得嚇人（約莫50%的超高離婚率）⁵，中老年離婚甚至再婚也不是稀罕之事。

捷克的性意識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基督教及社會連帶的壓抑，迎來了共產時期短暫的性自由又折返回歸家庭私有化及要求保守的年代，如今的捷克依然如此充滿悖論的在性意識上自由且開放、迫不及待地共組家庭，卻也勇敢追求再一次的自由與回歸自我，看似有點驕縱又孩子氣的任著自己的性子做事，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無懼和反抗壓抑的呈現，嬰兒箱反應了這些歷史脈絡習得的文化，但也因為政策的斷裂而產生各式分層和思維。嬰兒箱是務實的，他解決了女性不想成為母親的煩擾，也給予一個不被期望的孩子再次重生的機會；嬰兒箱是同理的，他展現了捷克人對於錯誤及失敗可以重新再次來過的勇氣；嬰兒箱也是自由的，他是一種個人自由的

展現，但可以被說為是不經考慮、逃避困難的不負責任的表徵。透過回溯過往捷克所經歷的歷史政策與現代的性意識、家庭觀念脈絡，延伸至嬰兒箱作為性行為及性意識文化下的產物才得以連貫的洞察捷克人對於「性—慾望」的概念表現。

嬰兒箱在捷克的設置依然具有爭議，以法律上的合法效力及細節施行的規定為最大考量，醫院、律師、法官或兒童團體仍對嬰兒箱持批評態度⁶，參考新聞底下的匿名投票則是以懸殊的比例支持嬰兒箱的設置，合法的匿名棄嬰對婦女及嬰兒來說皆是最好的選擇，但社會道德及倫理所跨不過的那道門檻，才使得嬰兒箱作為調節者出現。大多數捷克人都認為嬰兒箱僅可以使那些「不想成為母親」或沒有能力作為一個媽媽的婦女能夠擁有「犯錯」的空間，務實的捷克人將犯錯後的修補看得比道德上的抨擊更加重要，甚至認為犯錯都有值得學習及欣賞之處，一個婦女懷孕並不代表對於媽媽的角色認同，而對母親角色的排斥更有可能使得嬰兒在未來的成長階段無法獲得良好的照護。嬰兒箱不是「拋棄嬰兒」而是卸下「成為母親的責任」打破血緣連結重新創造身份，對新生許下祝福。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捷克查理大學交換生。）

¹ Ian Harvey, "Foundling Wheels" were designed to provide a safe way to abandon unwanted babies, May, 09, 2017, <https://www.thevintagenews.com/2017/05/09/foundling-wheels-were-designed-to-provide-a-safe-way-to-abandon-unwanted-babies/>

² 維基百科：棄嬰保護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84%E5%AC%B0%E4%BF%9D%E8%AD%B7%E8%89%99>

³ 捷克嬰兒箱官網：<https://www.babybox.cz/>

⁴ 2019年10月16日 Baby box 的統計資料「statistika-babyboxu」取自官網 <http://www.babybox.cz/media/pdf/statistika-babyboxu.pdf>

⁵ Eurostat: Archive:Marriages and births in the Czech Republic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Archive:Marriages_and_births_in_the_Czech_Republic

⁶ Robert Tait, Baby boxes in Czech Republic: 'the first thing should be the child's right to life', June, 10, 2012,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un/10/czech-republic-baby-box>

2020 年環法自行車賽

環法自行車賽（法語：Le Tour de France）是一個每年舉辦的多賽段公路自行車賽，主要在法國進行，但有時也出入周邊國家（如比利時、德國）。自從 1903 年開始以來，每年於夏季舉行，每次賽期 23 天，平均賽程超過 3500 公里（約 2200 英里）。完整賽程每年不一，但大體上為環繞法國一周。

2020 年第 107 屆環法公路自行車賽將在 8 月 29 日開賽，從蔚藍海岸地區（Côte d'Azur）的尼斯（Nice）出發，最後在巴黎（Paris）的香榭麗舍大道結束，為賽程劃上精彩的句點。從普羅旺斯地區（Provence）到奧維涅地區（Auvergne），從阿爾卑斯山脈（Alpes）到底里牛斯山脈（Pyrénées），從里昂（Lyon）到歐西塔尼大區（Occitanie），比賽路線將包括 8 個山地賽段（其中 4 個為山頂終點），3 個起伏賽段，9 個平路賽段以及 1 個個人計時賽段。比賽將經過法國五大著名山區，包括阿爾卑斯山區，中央高原，庇里牛斯山區，汝拉山區以及孚日山區。來自世界各地的車迷們，不僅可以觀看精彩刺激的比賽，還可以欣賞沿途美麗迷人的風景。

環法自行車賽是三大自行車環賽之一，另外兩個賽事為環義自行車賽和環西自行車賽。

參考資料：<https://kknews.cc/zh-tw/sports/3qm6gzy.html>；<https://cn.france.fr/zh-hant>